

民國史研究叢書之六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中冊）

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出版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中冊）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二月初版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全三冊）

定價：
精裝新臺幣 四二〇元
美金 一〇二元
平裝新臺幣 三六〇元

著者：黃 季 陸 等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發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三段二二五號

承印者：裕台公司 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中冊）

目次

論述

二、中山先生與世界

辛亥革命運動與香港·····	蔣永敬·····	五〇五
香港「中國日報」的革命宣傳·····	陳三井·····	五二七
孫逸仙博士策進革命運動與香港的關係及香港所保存的革命史蹟·····	余偉雄·····	五四五
南洋華人對孫中山先生反滿革命運動的貢獻及其與香港的聯繫·····	李恩涵·····	五七五
國父在日本·····	陳鵬仁·····	五九一
中山先生與中國興業公司·····	彭澤周·····	六〇九
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的探討·····	林明德·····	六三九
孫中山先生護法時期的對日政策·····	李雲漢·····	六五九
孫逸仙博士與亞洲民族獨立運動·····	李雲漢·····	六七三
孫中山先生與初期韓國獨立運動·····	辛勝夏·····	六八七
美國與孫逸仙博士·····	王綱領·····	七〇三

三、川路風潮

辛亥四川保路運動與武昌起義——有關史料之處理問題·····	黃季陸·····	七二三
「辛亥年四川保路運動史料彙編」序文·····	黃季陸·····	七三三
鐵路國有問題與辛亥革命·····	全漢昇·····	七三九
川路風潮——武昌起義前的一把革命火炬·····	劉岱·····	八〇一
辛亥革命在成都——對當時社會民情的分析說明·····	李璜·····	八二一
四川保路運動與辛亥革命·····	周開慶·····	八三七
蒲殿俊與川路風潮·····	張朋園·····	八四五
同盟會與川路風潮·····	朱文原·····	八五七

孫中山先生與辛亥革命（中冊）

論述

二、中山先生與世界

辛亥革命運動與香港

蔣永敬

一、前言

「辛亥革命」一詞，意指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中國所發生之大革命。由武昌起義推翻滿清王朝，而至建立中華民國。其間爲時不過四閱月。（註一）惟就革命運動的全部過程而言，應自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起而至一九一一年的中國大革命之發生，計爲時十七年。在此期間，革命運動波及的地區，至爲廣闊。由海外而國內，由點線而全面。就海外言，所有華人居留的地區，都會直接或間接的與此革命運動有關；就國內而言，幾乎全國各省，均有參與革命運動的份子，而各省也就先後不斷的發生革命事件。

革命運動的內容，不外立黨（組織）、宣傳、起義三大要項。此三大要項的意義，孫中山先生曾有說明：「求天下之仁人志士，同趨於一主義之下，以同致力，於是有立黨；求舉國之人民，共喻此主義，以身體而力行之，於是有宣傳；求此主義之實現，必先破壞而後有建設，於是有起義。」（註二）

命的主義。不過就辛亥革命運動的全部歷程來看，各個地區由於條件的不同，其革命運動的重點亦有因此，推動革命運動的，須有革命的思想（主義）爲其動因外，還須有組織、宣傳、起義，以實現革命，有的在組織方面特別重要，有的在宣傳方面成就較多，有的在起義方面貢獻更大；甚或某些地區在某些特定時期內，僅對革命運動中的某一項有所表現而已。

就革命運動的動因及內容來看香港在辛亥革命運動的過程所中扮演的角色，無論就革命思想方面，以及組織、宣傳、起義各方面來看，其地位之重要，遠非其他任何地區所可比擬。以下則就革命的思想、組織、宣傳和起義，在香港的發生和活動，來探討辛亥革命運動和香港的關係。

二、革命思想的發源

辛亥革命運動，倡自孫中山先生。而孫先生之革命思想，實發源於香港。正如孫先生本人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日，在香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指出：「我之思想發源地卽爲香港。至於如何得之？則三十年前在香港讀書，暇時輒閒步市街，見其秩序整齊，建築閎美，工作進步不斷，腦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又云：「又聞諸長老，英國及歐洲之良政治，並非固有者，乃人經營而改變之耳。從前英國政治亦復腐敗惡劣，顧英人愛自由，僉曰：『吾人不復能忍耐此等事必有以更張之。』有志竟成，卒達目的。我因遂作一想曰：『曷爲吾人不能改革中國之惡政耶？』因此，孫先生特別強調：「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於香港。」（註三）

孫中山先生到香港求學，是在一八八三年冬，初入英國聖公會主辦的拔萃書室(Diocesan Home)

，次年四月，轉學香港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後改稱皇后書院(Queen's College)。這年冬，一度離開香港去檀香山。一八八五年四月回國。次年入廣州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的附設醫科學校習醫。一八八七年一月轉入香港新創之西醫書院(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至一八九二年七月畢業。(註四)總計孫中山先生早年來往香港及在港求學的時間前後達九年之久。孫先生在一八八三年冬到香港求學時，其革新求變的思想，已很顯明。這時，他因倫敦傳道會長老區鳳墀的介紹，認識新到香港傳教的美國網紀慎會(American Congregational Mission)牧師喜嘉理，遂即受洗，署名「日新」，是取義大學盤銘「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去舊革新的決心由此充分的顯現出來。

根據孫先生的自述，他是在一八八五年的「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的。(註五)據孫先生一位美國朋友林百克(Paul Linebarger)記述孫先生的回憶，更有進一步的詳細說明，他指出「中法戰爭開始時，他(孫先生)並不在中國，因為他在香港學校裏，所以有機會知道戰爭經過……，在戰爭的昏暗中有一樁事件發生，可以證明中國人雖在外族專制統治之下，也不是沒有愛國心。這個意外的事發生於一隻法國兵輪，從臺灣來因大受損傷，到香港修理。中國工人因為這是敵艦，修好之後，要去打自己國裏的，於是拒絕工作。這個熱誠的舉動，給孫先生希望革新的勇氣。這個抵制修理兵船的事實證明中國人已經有相當覺悟；雖然是微小而被動的，但見此事可以證明轉移到自動的動作將要來了。」此時孫先生也開始考察滿清的兵備，論其人數和軍器，他得到完滿的報告，他們並不用外國式的槍砲和機關槍。他知道滿清的軍法規例，他秘密進行推翻滿清的心愈加厲害了。(註六)

可知孫先生決志推翻清廷、創建民國，雖起因於中法戰爭，而其思想的發源地，實來自香港。

在孫先生腦海中，「革命」與「維新」（改革），是一體兩面、相輔爲用的。所謂「改革之思想乃革命之起點也。」世界各國歷史的演進大多是如此的。（註七）當孫先生一八八七年進入香港西醫書院求學後，當時一些倡導改革運動人士的言論，對於孫先生的思想，可能是有很多影響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要算是何啓和、鄭觀應等人了。

何啓是廣東南海人，爲倫敦傳道會何福堂牧師之子，一八五九年生於香港，在中央書院畢業後，負笈倫敦，習醫學及法律。一八八一年回香港，任律師，並爲香港議政局議員。爲香港西醫書院發起創辦人，並在西醫書院執教，與孫先生有師生之誼。一八九五年孫先生謀舉義於廣州時，頗得何氏之支助。（註八）可見兩人關係之密切。何氏後來雖直接參與革命，但他却是一位愛國憂時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的熱心改革家。就在孫先生進入香港西醫書院這年（一八八七）的五月，曾在香港發表一篇長達一萬七千餘字的政論，題名爲「書曾襲侯『中國先睡後醒論』後」，以駁論曾紀澤當年所發表的「中國先睡後醒論」。其中所提出的觀點更引起孫先生內心的共鳴。（註九）何文所提出的觀點，與孫先生後來所發佈的「香港興中會宣言」，頗有一些異曲同工之妙。例如何文中有：「數十年來，中國之所以見欺於強敵，受侮於鄰邦，而低首下心，甘作孱王，而屈爲軟國者，實坐內政之不修也。」又云：「今者中國政則有私而無公也，令則有偏而無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奴賤也。官吏如虎，而君上縱之，不啻如鷹犬也。」（註一〇）而一八九五年一月的「香港興中會宣言」指斥清廷有云：「政治不修，綱紀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註一一）

鄭觀應爲廣東香山人，與孫先生爲同鄉。在孫先生就學香港時，鄭在上海充任電報局總辦。孫先生曾去函上海與他「研討改革時政意見」。兩人的認識，可能在一八九〇年因陸皓東之介紹而在家鄉會晤的（註二）。鄭氏在一八九二年編撰定稿的「盛世危言」，是中國近代倡導革新變法的一部早期著作，對於後來的救國運動具有很大的影響。該書中的「農工」篇，已被若干學者認定出自孫先生的手筆；或至少係採納孫先生的思想與觀點。從這一篇文字中，很可以看出孫先生當時對清廷的不滿，很有反抗的意旨，有謂：「蓋天生民，而立之君，朝廷之設官，以爲民也。今之悍然民上者，其視民之去來生死，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然。何怪天下流亡滿目，盜賊載途也！」（註三）

孫先生既懷抱救國大志來到香港求學，以其中外語文的基礎，加以西醫書院科學的訓練和實驗，香港自由的風氣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便捷，自是博覽羣籍，以求救國之道。所以他在二八九六年的自述中說道：「文早歲志窺遠大，性慕新奇，故所學多博雜不純，於中學則好三代、兩漢之文；於西學則雅癖達文之道（Darwinism）；而格致、政事，亦常流覽。至於教則崇耶穌，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註四），按「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古訓昭然。華盛頓則爲美國獨立革命開國之父，亦如孫先生後來之爲中華民國之父。

三、革命組織的起點

辛亥革命運動最早的革命團體，是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所創立的興中會；香港興中會雖遲於檀香山興中會不到三個月，（註五）但香港興中會主要人員的結合和進行鼓吹

革命，則較檀香山興中會爲早。香港興中會的基礎，實由所謂「四大寇」和香港輔仁文社的成員所構成。馮自由曾謂：「香港乃清末『四大寇』多年放言無忌之政談所，亦爲興中會本部之策源地。」

（註一六）所謂「四大寇」者。革命時代孫中山、尤列、陳少白、楊鶴齡四人之綽號也。四人之相聚，應始於一八九〇年。蓋是年一月，陳少白因孫先生之介紹，始至香港西醫書院註冊入學也。（註一七）楊與尤，和孫先生認識較早。楊爲廣東香山翠亨村人，生於澳門，家世豪富，性不羈，喜諧謔，與孫先生結識最早。有商店在香港歌賦街曰楊耀記，嘗在店內獨闢一樓爲友朋聚集談話之所。孫先生至港恒下榻其間。尤字令季，又號少執。廣東順德人，少肄業於廣州算學館，歷充廣東興圖局測繪生，香港華民政務司署書記等職。自幼好與洪門會黨遊，久有興漢逐漸之志。當孫先生一八八六年習醫於廣州博濟醫院時，邂逅相識。陳原名鑾石，後改名白，字少白，粵之新會人，廣州格致書院（即後之嶺南大學）開創時第一期學生，因其父子橋之友區鳳墀的介紹，至香港訪晤孫先生，一見如故。因孫先生之介紹，轉入香港西醫書院就學。時尤列亦在港任華民政務司署書記。故孫、陳、尤、楊四人每日在楊耀記高談覆滿，興高采烈，時人咸以「四大寇」稱之。（註一八）

輔仁文社者，香港僑商有志者所組織之小俱樂部也。我立於一八九〇年，其時去中法之役未遠，國人漸知滿清政府之不足恃，及研究新學之必要，港僑中遂有福建海澄人楊飛鴻（字衢雲），廣東開平人謝纘泰（字康如）二人，聯絡有志者劉燕賓、陳芬、黃國瑜、羅文玉、胡幹之、周昭岳、何汝明、溫德、溫宗堯、陸敬科等十六人，發起輔仁文社，以開通民智、討論時事爲宗旨。是爲港僑設立新學團體之先河。其開會地點，初假劉燕賓所開之炳記船務公司。至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始開設會所於百子

里第一號二樓。此社內容，僅在多購置新學書報，以開通民智，尙未含有政治上之激烈性質。（註一九）
輔仁文社人員與「四大寇」之接觸，應在一八九二年。據馮自由之「與中會首任會長楊衢雲補述」記云：

「社員（輔仁文社）中有羅文玉者，與順德尤列善，嘗介紹之於文社，屢至談學，因得與諸人游。是將尤列與其友香山孫君逸仙密謀民族革命，有四大寇之稱。初識公（指楊衢雲，下同），卽有相見恨晚之感。……清光緒壬辰（一八九二）秋，羅文玉設婚筵於上環壽而康酒樓。文社同人畢至，尤列繼至，與公倚欄縱談時務。公所論者，政治改革之事，偶叩其家世，則先世讀史棄官出洋，因而本身出生於香港之說。侃侃道之。尤曰：『得之矣！君所發揮者，政治之改革耳。此卽令先祖讀史棄官之意，君知之乎？』公曰：『何如？』尤君曰：『不有種族問題在耶？棄官者，不爲滿清奴也。』公點首者再。次日卽造尤寓。同詣歌賦街楊耀記楊鶴齡寓訪孫君逸仙暢談救國大計。一見如故，由是朝夕常至，至則抵掌而談，達旦不倦。」（註二〇）

根據前文的記述：楊與孫先生的晤談，既甚融洽，於是楊主張先在廣州組織團體，以共策進行。孫先生亦甚同意。孫先生因先後設立藥局於澳門及廣州，外表則以醫術問世，實際則是日聚同志，相與計劃革命進行之方略。一八九三年多初，開會議於廣州城南廣雅書局內南園之抗風軒。到會者有孫中山先生及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陸皓東、魏友琴、鄭士良、尤列諸人。孫先生提議宜先成立團體，以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爲宗旨。衆贊成之。而不及制定會名，時楊衢雲在港，未克與會。會後尤列赴港，爲楊道之。楊大稱善（註二一）另據其他資料記載，參加抗風軒會議者，亦有輔仁文社的社員

周昭岳（註三）故知輔仁文社與「四大寇」之間雖無形式上的組織，但雙方自一八九二年以後已有精神上的結合了。因此，輔仁文社的主要社員後來之加入興中會，乃是水到渠成的事。

孫先生於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後，鑒於國內發難時機成熟，乃於次年一月自檀香山回到香港，即召集舊友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楊鶴齡、尤列、區鳳墀等商討籌設興中會總部，以擴大興中會之基礎。因與輔仁文社負責人楊衢雲接洽，勸將該社併入興中會，楊欣然應諾。陸續締盟者更有謝纘泰、黃詠商、周昭岳、余育之、徐善亭、朱貴全、丘四等數十人。籌備既竣，租定香港中環士丹頓街十三號為總會所，託名為「乾亨行」。於一八九五年二月二十一日開成立會，會名仍稱興中會。凡入會者一律宣誓。根據檀香山興中會所訂之章程加以修訂，規定總會與支會之權限。

（註三）

值得注意的，這次香港興中會總會的成立，其基本成員，所謂「四大寇」固已全部加入，而孫先生過去的好友如鄭士良、陸皓、東區鳳墀等也都入會。輔仁文社的社員加入者為楊衢雲、謝纘泰、周昭岳等三人。新的重要會員則有黃詠商、余育之等。黃係粵之香山人，世居澳門。父名勝，任香港議政局議員。與何啓有戚誼。黃之加入興中會，即由何啓介紹。（註二四）余為港之富商，日昌銀號東主，由楊衢雲介紹入會。這年十月，興中會所進行的廣州起義，黃、余兩人在經費上曾提供巨額的支援。

。（註二五）

四、革命宣傳的重鎮

在辛亥革命運動的過程中，革命黨人在香港地區所作之宣傳活動，就時間言，它是革命宣傳活動最早而爲時最久的地區；就空間言，它對華南和南洋地區的革命運動，有重大之影響。

據孫中山先生自述：「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註二六）是則孫先生一八八七年一月轉學香港西醫書院的目的，除習醫外，則爲宣傳（鼓吹）革命。由於香港比較自由，所以他在香港求學的「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於香港、澳門之間，大放厥辭，無所忌諱。」不過由於當時風氣未開，宣傳的效果似乎不彰，因此：「時間而附和者，在香港祇陳少白、尤少紉、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若其他之交游，聞吾言者，不以爲大逆不道而避之，則以爲中風病狂相視也。」但孫先生並不氣餒，他仍然和陳、尤、楊「四人相依甚密，非談革命無以爲歡，數年如一日。」故港、澳間的戚友交游，皆稱呼他們爲「四大寇」。（註二七）也就是四位大革命宣傳家。

至於宣傳的方式，由於當時的條件所限，很顯然的，口頭的宣傳多於文字的宣傳。而口頭的宣傳，不僅可以大放厥辭，無所忌諱，而且可以面對面的討論。至文字的宣傳，則因對象之不同，則不能不有所保留。故口頭的宣傳，可以充分發揮革命、排滿的意思；而文字的宣傳，則常表現改革、維新的面目。前者的例子不勝枚舉；（註二八）後者可以孫先生早期的幾篇文字爲代表，如一八九〇年的致鄭藻如書；（註二九）稍後收入鄭官應「盛世危言」書中的農功篇；一八九四年的上李鴻章書，以及一八九五年十月在廣州撰刊的農學會緣起書，均充分表現維新的色彩。甚至檀香山和香港興中會的章程（

宣言），也沒有激烈的詞句。這些比較溫和的文字，顯在適應當時的社會環境，而不應據以否定其革命思想。但與中會の入會誓詞，因屬秘密性質，就大爲不同了，却明白的標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

香港與中會初期，並無固定的宣傳機構，多是利用當地同情於革命的報紙或有名望的人士爲之宣傳，尤以香港議政局議員何啓、香港德臣西報（China Mail）主筆黎德（Thomas H. Reid）、士蔑西報（Hong Kong Telegraph）主筆鄧肯（Chesney Duncan）諸人的支持爲重要。當時的宣傳活動，謝纘泰在其「中國革命秘史」中有幾項記載如下：（註三〇）

三月十二日（一八九五年），何啓的「改革論」發表於「德臣西報」。

三月十八日，「德臣西報」著文支持革命。

三月二十一日，孫中山、楊衢雲、黃詠商、謝纘泰與鄧肯會於「乾亨行」，鄧肯答應支持革命。

「士蔑西報」表示支持革命運動。

五月三十日，謝纘泰於「德臣西報」、「士蔑西報」等發表致光緒皇帝公開信。

十月九日，對外宣言由黎德、高恩（I. Cowen）起草，由何啓、謝纘泰修正。

一八九五年十月孫先生在廣州起義失敗，後革命黨人紛紛離開香港。革命黨在香港的宣傳活動也就一度消沉。一直到一八九九年秋間孫先生始派陳少白到香港籌辦黨報，兼爲黨務、軍務之進行機關。少白蒞港後，先向老友何啓、區鳳墀查探當地官吏對革命黨的態度，得知少白可以留港不受拘束。於是租定中環士丹利街二十四號爲報館發行所，取「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之義，定名爲中國日報。

經營數月，至一九〇〇年一月出版。此爲革命言論機關之鼻祖。初出版時，少白社長兼總編輯。先後助理筆政者有洪孝衷、陸伯周、楊肖歐、陳春生、黃魯逸諸人，英人繙譯有郭鴻逵、周靈生等。初以不審英人對策態度，未敢公然大倡革命排滿之說，半年後措詞始漸激烈。此報除日報外，兼出十日刊一種，定名爲中國旬報，附以鼓吹錄，專以遊戲文章，歌謠譏刺時政，是爲中國報紙設置諸文、歌謠之濫觴。（註三二）

香港中國日報不但是革命黨最早的言論機關，而且是在辛亥革命運動過程中持續最長的一個報刊，它從一九〇〇年一月在香港創刊後，一直連續到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廣東光復，始遷往廣州繼續發行，前後在香港發行的時間達十一年之久。其對革命運動的影響，是非常廣泛而深遠的，其影響力之所及，可從國內及海外兩方面來看：

就對國內方面言，受影響最大者在廣東方面。由於中國日報的成立，不僅使廣州的輿論界爲之丕變，即華南地區的革命空氣，亦有風雨欲來之勢。就輿論方面言，港、粵各報過去受康有爲、梁啟超維新派言論的影響，始稍談新學和時事。但自中國日報大事抨擊滿清惡政以後，粵人多紛紛購讀，尤以政界銷路爲多，廣州各報以相形見絀，遂亦漸以提倡新學爲言。（註三三）就革命形勢言，中國日報不僅爲革命的言論機關，亦爲革命黨人聯絡聚會之所。一九〇〇年，孫中山先生派陳少白及楊衢雲、鄭士良、史堅如等經營廣州、惠州軍事，報中來客頗形熱鬧，在報館下榻者有史古愚、史堅如、蘇卓南、張碩臣等；時到報館聚談者有楊衢雲、鄭士良、宋少東、鄧蔭南、李紀堂、畢永年、區鳳墀，以及日本志士原口聞一、宮崎寅藏、平山周、山田良政，英人摩根（Rowland J. Mulkern）等，實不下

百數十人之多。及是年惠州、廣州兩地起事失敗，義師將士羣至機關部求助，報中經濟能力大受影響，幸有香港富商李紀堂的支助，得使此報維持不墜。（註三三）並銷行於廣東各縣及海外各埠，異常發達，對革命思想之傳佈，有一日千里之勢。（註三四）

就對海外方面的影響言，中國日報銷往海外各地的華僑界，亦使華僑界的思想爲之變化，例如菲律賓賓首府馬尼刺華僑之傾向革命，約在一九〇四及一九〇五年間，時有香港中國日報及世界公益報在各該地各銷售數十份，復有閩籍西醫鄭漢淇、青年楊豪侶向僑衆抨擊清政，閩粵僑胞多爲感化。一九〇六年保皇黨徐勤在菲宣傳立憲並欲設立帝國慶政會，徐幾被僑衆毆傷，致卒無所成。（註三五）其他各地僑界，因受革命思想之影響，有革命報紙的舉辦，有向中國日報要求推荐主筆或記者的，亦有與中國日報在言論上互通聲氣者。前者如一九〇四年新加坡出版之圖南日報、一九〇七年檀香山出刊之自由新報、一九一〇年加拿大溫高華發行之大漢日報，均由香港中國日報派人前往負責編輯。（註三六）後者如臺灣之臺南日報、曼谷之華暹新報、舊金山之大同日報、澳洲之警東新報等，均與中國日報互通聲氣者。（註三七）

五、革命起義的基地

自孫中山先生一八九五年成立香港興中會以後，到一九一一年辛亥大革命以前的十七年間，香港始終成爲革命黨對國內活動之策源地，更是對華南策動軍事起義的基地。單就革命運動中的起義一項活動來看，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起義以前，國內各地發生反清武裝起義的事件，計爲